

單冀凱旋？ 閩人董伯起的意外東瀛之行

■ 蔡承豪

由浩瀚無邊湛藍海洋所串連與構築的舞臺，在無限延伸當中為各式人群提供了相遇的契機。十六、十七世紀多元動盪的國際關係與複雜的海上情勢，除影響了大歷史的走向外，也讓有些小人物意外地有了獨一無二的奇幻「出國」之旅。

前言

知道董伯起這位晚明福建省閩縣（今福建福州）籍的歷史人物嗎？絕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沒有聽過他，即便是熟知該時代的研究者與歷史愛好者大概對他也相當陌生。但他卻在明萬



圖 1 日本是國人最常造訪的國家，圖為歷史名勝景點大阪城。
林姿吟攝

曆四十四～四十五年（1616-1617）間，有著一段驚奇的「出國」遊歷——前往東瀛。

若說到現今臺灣人出國的首選，日本毫無懸念穩坐人氣冠軍。（圖 1）而造訪的原因絕大多數都是前去旅遊，另有部分則是為了商務與求學。然董伯起前往東瀛並不是因為上述理由，甚至於他是在沒有準備、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就被強迫擄往海的彼端。而當大家都以為董伯起可能已經命喪異國時，卻又突然回到了閩地，送回他的日籍船隻上，還立著「單冀凱旋」的旗幟。這樣的規模，讓接到消息的明朝官員一頭霧水，著實審問了一番才接受董伯起造訪異國的整個過程。

從變局走向新秩序

董伯起受到這樣的待遇，是因為他是地方或官場的重要人士嗎？從現存的文獻檔案來看，關於其生平的歷史文獻甚為稀少，而在他被捲入事件時的身分也有各種說法。這樣的情況應象徵著他進入歷史文獻的狀況是在相當緊急且消息混亂的時期。

目前只能推測，他的主要活動年代約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期。若速觀這一時期的東亞地區，知名的歷史人物可列舉者如明朝的明神宗（1563-1620）、明熹宗（1605-1627）、徐光啓（1562-1633），以及年輕的鄭芝龍（1604-1661）等。在日本，則有年近遲暮的豐臣秀吉（1537-1598）、其子豐臣秀賴（1593-1615）、開創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1542-1616），以及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等。在朝鮮王朝，則是光海君（1575-1641）與李舜臣（1545-1598）活躍的時期。來自義大利、製作〈坤輿萬國全圖〉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22-1610）正逐步打入明朝的核心；而湯若望（德語：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於1619年方千里迢迢的航抵澳門，雖一時受阻，最終於1623年抵達北京。

這些東西方人物的交會，正反映著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劇烈的變動。東亞原有的朝貢體系之變動，來自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勢力，明朝在1567年開放月港通商、部分解除閩南海禁，日本倭寇的活躍……等多重因素，使得東亞海域進入更為活躍又充滿不確定性。中國南方的福建沿海以及位在東亞交通樞紐的臺灣，也被捲入大時代變局當中。（圖2、3）

隨著各式的接觸、碰撞與摸索後，在1580



圖2 1607 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亞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繪 031962



圖 3 17 世紀初期以後 利瑪竇編繪；張文燾過紙 坤輿萬國全圖 局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101526

年代，中國沿海逐漸恢復了秩序。而日本的戰國時期也在十六世紀末進入尾聲，豐臣秀吉統一全國後，控管了各地的海上勢力。他更欲建立屬於自身的朝貢體系，先是發動了「萬曆朝

鮮之役」（日本稱為「文祿・慶長の役」，朝鮮方面稱為「壬辰倭亂」，1592-1598）撼動東亞秩序，且曾欲招諭高山國、也就是臺灣，更遣使往琉球國、呂宋（今菲律賓，當時為西班牙

牙—葡萄牙聯邦殖民地），惟這些行動在其逝世則告終止。¹而德川家康隨後數年內成為幕府將軍，登上權力的高點，並持續嚴格掌握海上活動。這些統一政權的出現與確立，終使中國沿海的日本海盜活動逐漸減少。但這並不代表著德川幕府放棄了與中國商貿的機會，其透過核發「朱印狀」的特許貿易方式，讓獲得核准的日本商人前往各地貿易；²並試圖以和平、合法的貿易為基礎，與中國沿海重新展開聯結。但這樣的志向即便幕府曾希冀透過朝鮮或琉球來建立正式關係，卻因明朝仍未撤銷對日貿易禁令而受阻。³

前進「高砂國」的意外漂流

在日本幕府試圖經由朝鮮和琉球接近明朝朝廷的努力失敗之後，某些日本船舶貿易商仍試圖與中國地方官府直接進行非正式接觸，其中一個執行者為長崎代官村山等安（?-1619）。

村山等安長期經營海外貿易，同時也是朱

印船貿易商。日本慶長二十年（1615）7月，村山等安在獲得德川家康所發的「高砂國渡船朱印狀」後，隨即著手準備前往高砂國——即臺灣的事宜。⁴德川幕府此舉，是希望可以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鄰近處，建立一個貿易中繼點。當時臺灣不屬於中國版圖，佔領並不會立即引發領土糾紛，且離福建不遠，並位居東亞交通樞紐。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籍的給事中傅元初即點出臺灣的地理位置優勢：

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闖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⁵（圖4）

另當時社會上尚有說法認為，德川幕府的指示實際上是為了要搜尋在大阪夏之陣中逃出大阪城的豐臣秀賴等人。⁶至隔年（1616），村山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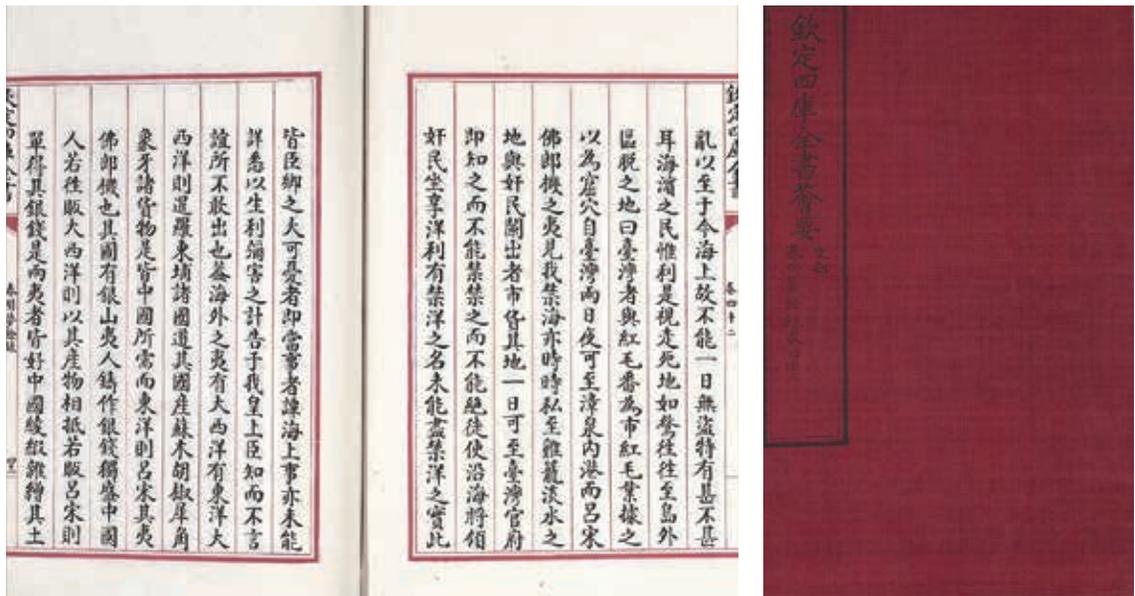


圖4 明—清 孫承澤 《春明夢餘錄》 清乾隆間欽定四庫全書叢要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4215

籌組共計 13 艘船的船隊完成後，即以次男村山秋安（?-1619）擔任指揮官，率領明石道友等人及約 2～3 千名船員出發，可見對此事的重視。

這麼大型的活動，很難不被周遭國家所察覺。如琉球王國雖然在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被薩摩藩以武力降服控制，尚寧王（1564-1620，1589-1620 在位）君臣並在隔年被迫於鹿兒島與薩摩簽訂《掟十五條》，從一個獨立自主的王國變成薩摩藩的附屬。但琉球並非完全聽從薩摩，亦間歇向明朝通報日本南下動向。故當日本元和二年（1616）舊曆 3 月末，船隊大舉出動後，消息隨之傳開，琉球王也趕緊派遣通事蔡塵率隊前往福建通報。

蔡塵一行人在 4 月 23 日時抵達福建沿海，根據福建五大水寨之一的小埕水寨把總劉承慶通報表示：

本月二十三日，據捕盜周龍報稱：本日寅時瞭見進嶼外洋，有異船一隻駕使。查係琉球人眾，旗懸「報倭」二字，攔在長澳外海拋泊，飛報到職。該職親自駕船到彼，據通事蔡塵手執執照一張、咨文一角，吐報在船人眾止十七名……。⁷

而訊問期間，蔡塵還誇說此次村山秋安的船隊規模有「戰船五百餘隻，欲協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為害閩海。」所謂的雞籠山，除指的是臺灣北部外，並與「東番」、「高砂國」、「北港」等詞一樣，是臺灣的代稱或泛稱之一。（圖 5）故當時的福建巡撫黃承玄（1564-1620）接到通報後，即指出：「竊思雞籠山雖是外島野夷，其咽喉門戶有關閩海居地；藉令肆虐雞籠，則福省之濱海居民焉能安堵如故。」遂緊急上疏朝廷，建議沿海各省應加強戒備。

而在明朝戒備之際，村山秋安的船隊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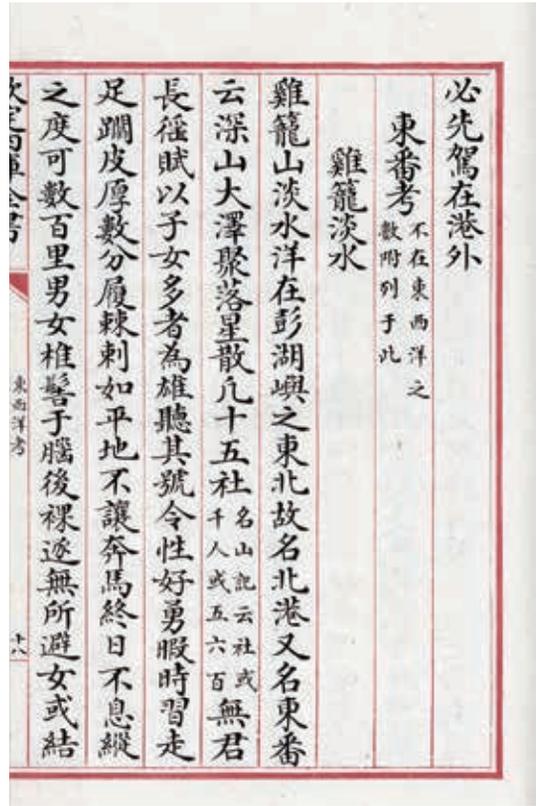


圖 5 1617 張燮《東西洋考》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78

發後卻是命運多舛。船團離開長崎，先於九州地方最西端的五島列島進行補給後即陸續南下。但這趟預定佔領臺灣的航程卻未如預期順利，船隊駛到琉球海面時遭暴風雨打散，其中村山秋安所率的三艘船漂到了交趾（今越南），只有一艘船到達臺灣北部。但這艘抵達的船隻並未能完成佔領的任務，船上的一、兩百人在登陸後反被原住民族頑強抵抗並包圍，最後喪失性命。

人人震駭下的小人物登場

而由部將明石道友所率領的另外兩艘船，則在 5 月初漂流到中國沿海的浙閩交界處，隨著與明朝海軍追逐多次後，暫於福建北邊海域的甌山、礮山、東湧（今馬祖列島的東引島）

等地徘徊，並在當地劫掠。雖然只有兩艘船，但從後來偵查所見「大倭船二隻，各載壯倭一百三、四十人；又白艚大船一隻。船內器銃精利、銀錢滿載」，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⁹加上語言無法溝通，因而散發出相當的威脅感。且過往倭寇反覆來襲的殷鑑不遠，當地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民衆，遂散布謠言稱：「倭遣蔡欽所、陳思蘭子，督船三百隻來報仇。」¹⁰這些傳言一出，隨即引起當地軍民人心惶惶，尤其是沿海居民，爭先恐後的跑到省城福州避難。

然僅是閉城自守，終究無法了解實際情況為何，後續又該如何因應。故黃承玄先以厚賞招募軍民出海偵探倭情，但一時並無人出來接下這個燙手山芋的任務。後出來應命者，便是董伯起。

董伯起為何會出來響應，他的身分是什麼，有著各式的說法。根據當時的福建福州兼海道副使韓仲雍（生卒年不詳）上陳萬曆帝（1563-1620，1572-1620 在位）的報告指出：「本道差出偵探把總董伯起」，¹¹似乎他是一位軍官。但明代重要海洋文獻、成書時間與此甚為接近的

《東西洋考》則載：「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¹²材官，即主將親兵的意思。另一份同時代的文獻《涌幢小品》則稱：「閩撫臺黃與參遣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倭。」¹³黃與參即黃承玄，而從這段敘述看來，董伯起似乎僅是平民。那他當時的身分究竟是什麼？

若要探究上述問題，可從一位與董伯起關係較深，且當初可能就是推薦他前去應命的人士之著作中找尋答案，這位人士就是董應舉（1557-1639）。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後官至工部侍郎兼戶部。《明史》評其為「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而《崇相集》為董應舉之著作，書名即來自其字。《崇相集》詳盡收錄董應舉所上涉及籌倭、防寇等之奏疏與各議，並有與各方大員、名將商論海上詭譎時流的往來書信。而任官期間，董應舉曾兩度回鄉，一在萬曆四十年代前期，一於天啓末年至崇禎之初，皆是中國東南海域多事之際，董應舉無可避免也涉入大時代的洪流中。董應舉首次在籍時，即遭逢此事件，更積極奔走運作。（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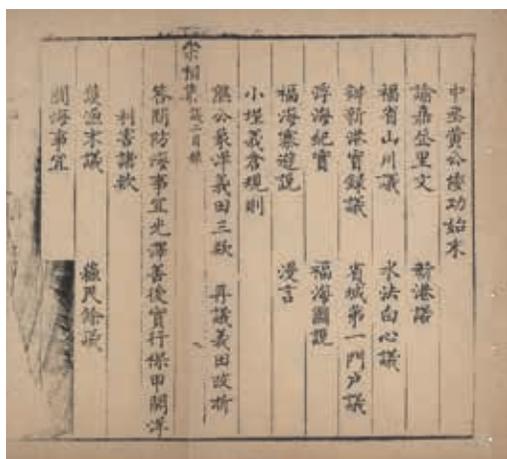


圖6 明 董應舉 《崇相集》 明萬曆四十七年呂純如等刊、天啓崇禎間補刊序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17046 ~ 017063

對於董伯起，董應舉曾稱「予之宗孫伯起。」另一項後世的方志紀錄則指出「董伯起，應舉族子也。」可見兩者是同宗關係。雖董應舉僅提及「軍門黃公以厚賞募人遠偵，而董伯起應命」，¹⁴沒有直接明說，但在《崇相集》當中有多篇記錄了董伯起的活動，甚至為其被擄的前因後果與不得已之處逐一剖析，不難想像董應舉居中牽線或推薦的角色。而根據《崇相集》，董伯起家一貧如洗，日後從東瀛返鄉後，更是「滿身皆債，日食難度」，怎麼看也不像是當把總的人，比較像是一介平民故，「義民」應是他當時的真正身分。但從事後的一些過程來看，董伯起具有書寫能力，又可以得到推薦，當非只是一般的販夫走卒。加以或許是因為任務在身，在出發前臨時被黃承玄於名義上授給最基層的軍官名號，讓其偵查時得運用資源。

探查遭擄

從董應舉的描述指出，董伯起在接受任務後，隨即出城探查，但在戒備之際，初始完全找不到船隻，後來好不容易在館頭找到一位施七的船。有了舟楫，並另募同傳盛、葉貴、李進等人，這個臨時組合的偵查團便於16日夜出航，17日天明先至馬祖群島的竿塘，一更再至橫山，18日早抵達東湧。抵達目的地後，董伯起上山張望，但因「二倭船泊在南風澳、布袋澳，篷檣俱卸；一白艚，藏在南磔伺船」，並沒有立即發現日籍船的蹤影。

正當眾人以為不速之客已經離開，鬆了一口氣之際，卻突然有一船張帆逐來，施七等有經驗的人判斷對方來意不善，擔憂一旦逃走不免被攻擊，因此選擇靜待對方靠近。相近後，日本船員及翻譯的通事隨即上船盤問他們的來歷，一行人先是回答說是討海船，後再被問到

有無看到兵船，水手們老實回答沒有，日人遂令他們上山運水。但過程中，明石道友逐漸發現董伯起膚色偏白，其手也不像是討海人該有的模樣，董應舉也曾稱「伯起生未識海」，故被識破，明石道友因而起疑持刀威脅逼問。董伯起見無法再隱藏，乾脆大呼「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軍門聞汝來侵，已造五百隻船以待；令我出偵。今日殺我由汝、不殺由汝；我兵船即至矣。」¹⁵這番話一出，讓日人議論紛紛。後通事轉述：「他是長崎島等安差來十一船，今二隻在此。彼國法重，去早、去遲皆殺；欲借汝首軍一人去報國王免罪。八月即送汝歸，無恐也。」即要將董伯起擄回日本，以對於此次攻臺行動失敗作出一些替代性的交代。

村山秋安率領的船團，整體而言可謂慘烈。其中一艘被殲滅於臺灣，三艘飄到越南、隔年才能返國；七艘沿著中國沿海北上，並在浙江與明朝海軍交戰後才返回長崎。而二艘飄到馬祖群島的船隻擄獲一名自稱是明朝軍官的人，或可算是小有收穫。且手無寸鐵的偵倭探察團面對威脅下，也沒有選擇的餘地。所幸明石道友只要董氏，施七、傳盛等人因而得以離開並帶著董伯起寫的歸報書，即偵查與其被擄事蹟的報告書回去通風報信。

即便做為俘虜，明石道友等人對董伯起算是禮遇。董氏要求網巾、漢式服飾等以正衣冠，都盡量配合。頭目也一同陪他用餐，並讓他參觀船內，更與其筆談。而到了19日中午，船仍未開，董伯起遂問通事說為什麼還不開船，通事回答說尚在等待其他的十一艘船。董伯起心想，光是二艘倭船已經讓省城驚慌失措，若另十一艘船也前來豈不更為大亂？便提議說可以在山壁上留字，其他日船看到自然就會得知下

一步動向。而經通事轉達，此建議果獲認同，明石道友等於該日中午便啓航離開，董伯起也展開了他的意外東瀛之旅。

謠言四起

董伯起被俘的消息，係隨同施七於22日攜帶著歸報書返回福州後而傳開。雖警報解除，民眾生活得以再度回歸正常，但更多關於董伯起的傳言，卻是開始散播開來。

由於不能確定董伯起是生是死，有些人士建議韓仲雍應該派員去長崎將人帶回，但實際上更可能是爲了要藉故前往日本貿易。也有傳聞說，董伯起根本沒去偵查，而是躲在家裡或某人家，抑或是誘倭爲害，或是學日人剃髮變裝等等，各種胡亂的謠言四起。¹⁶

部分負面傳言讓董應舉非常氣憤，如在〈答曾明克〉中便不客氣的指出：「前倭止二船，而七遊、五寨無敢發一矢；至伯起去，而偵始真。後倭數船，而七遊、五寨無敢出一砲；至右伯出，而倭始遁。」認爲要不是董伯起前去偵查，方使日船離開。而在〈答韓璧老海道〉中則指出「多少寨、遊，不敢一出；探報偵視，無一真息。」對於福建水師的無能埋怨表露無遺。對董伯起的膽識則是相當肯定，直呼「伯起生未識海，奉軍令偵探爲倭挾歸，尚能奮辭恐倭，誓死慷慨；觀其來書無一毫兒女態，某亦心壯之。」即便如此，某些董氏族親即便見過董伯起的書信卻仍跟著人云亦云，可想見謠言有多麼地熾烈。

看到種種亂象，董應舉除了命董伯起出去偵查外，並推薦了曾來過臺灣、並在澎湖立下「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的名將沈有容（1557-1627）重新肩負重任，以爲未來可能持續的動亂預先防範。沈氏曾陸續與日倭與荷蘭東

印度公司（VOC）船隊交手，但董應舉在推薦他時並沒有見過本人，只聽聞過他的武功事蹟。後巡撫黃承玄報請由沈有容擔任水標參將，以統帥水師。而沈有容後來拜訪董應舉，並見到歸報書，則曰「此子倉皇寫書、暇豫如此，必歸也」，不同於當時的傳言，反對於董伯起的回歸甚具有信心。

單翼凱旋？

到了隔（1617）年，董伯起果然回到了福建，送回的船隻還掛上書寫著「單翼凱旋」旗幟，看似頗爲隆重，但他真的「凱旋」而歸嗎？（圖7）

根據沈有容的通報，3月19日，有臺山遊兵船六隻押護倭船一隻，並送回董伯起，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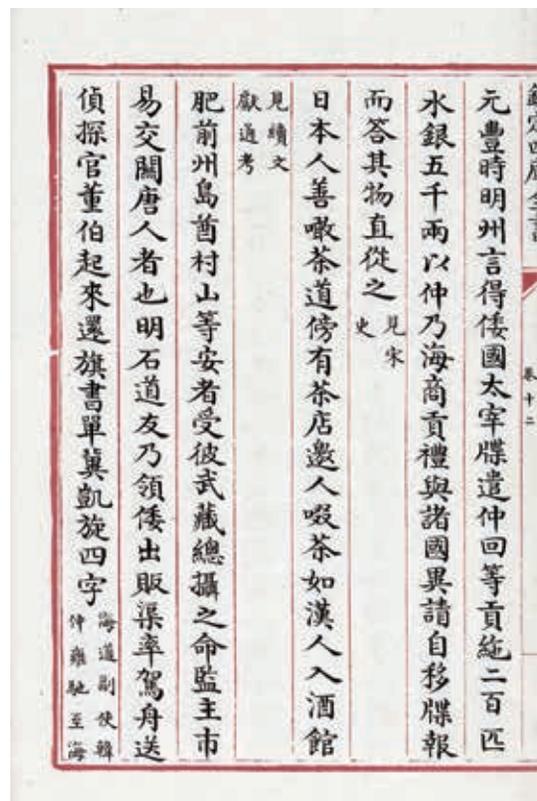


圖7 1617 張燮《東西洋考》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80

被小埕寨官兵攔住黃岐信地。原本行蹤不明的他竟然被日人安然送返，可謂大大出乎眾人意料，沈氏收到消息後，也隨即向上通報，並於22日將所率標船泊於浙江定海，只領總哨徐亮等坐駕烏唬船三隻直抵黃岐，探查情況。抵達後，明石道友帶領通事高子美以及董伯起登上沈的船隻面見，且根據董應舉的轉述，明石道友登船時還刻意不佩刀，沈有容遂問：「汝何不佩刀」，回曰：「不敢」。沈氏於是便取一長倭刀與佩，讓明石道友甚為感激。而對談中得知，此船於3月4日放洋，歷經半個月航程後抵達。成員除通事外，另有有頭目三名，隨衆七十四名、被虜的長樂縣廣石澳張士春、歐達老二名，並帶有表文、書劄、禮物等，顯然希望以此示好，尋求開放勘合貿易。

沈有容逐一詢問，並向董伯起確認，董氏表示日方「彼中別無船來，送回委無別意。」了解情況後，沈有容將白米二石、老酒二甕、豬羊各二隻過船賞賚，更把所坐唬船撥給他們搭乘。後帶回董伯起、明石道友、高子美等五人審問。

閩省高層面對這個突來情況，自不會輕易接納，甚至認為「今忽稱差官送歸、具表求和，事屬可疑」，在他們眼中，董伯起並不是英雄「凱旋」，這個小人物的歸來反而疑點重重，遂綁縛押解以待審訊。後海道副使韓仲雍馳至小埕，於4月19日展開盤問。雙方的交談顯示，明朝地方官員所關切的是日本有無占據東番——即臺灣之意，並責難其所引發的沿海騷動。而明石道友則強調先前出兵臺灣係爲了報仇，而非圖佔領。此次並只爲爭取通商而來，希望福建當局至少能尊重他的合法地位，不要把他和船員當成海盜，並接受國書。但雙方基本上並無交集，韓仲雍更強硬地表示「汝若戀



圖8 德川秀忠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nLge1d>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11月8日。

住東番，則我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以過番，兵交之利未分，市販之得喪可恣矣。」¹⁷此次的交涉，最終福建當局則以「章表不中式」，即不符合格式爲由，拒收所帶來的國書。

雖雙方會談並無交集，對於遠道而來的日籍船員們，福建高層仍予以賞賜。但沒想到船員一開始卻稱「伯起不受我物，我亦不敢受」，指出董伯起不接受日方的饋贈，所以他們也不接受。後來經過勸說下，方收下贈與。這不禁讓人好奇，董伯起在日本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根據明石道友的說法，由於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方於日本元和二年即位不久（圖8），希冀與四方國家、尤其是明朝建立起正式的關係。故在8月見到董伯起被送到後，即給予款待三日，並贈銀四十錠。沒想到董伯起毫釐不留，轉送給伴隨的日人，因此「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更親修書，贈以製衣二籠、倭刀二把，聊爲贖行見在。」¹⁸看起來董伯起這趟奇幻之旅，讓原先僅是要去短期探查之舉，意外變成了越洋東瀛行程，不僅見到了一般人難以

見到幕府將軍，其表現更讓日人刮目相看。

不過這樣的舉動，加上其返回閩省後即販賣倭刀，反而讓他在故鄉受到不少批評。董應舉遂爲其解釋，董伯起一貧如洗，卻不受餽贈，乃是因爲要故意展現節操，方得生還。從日籍船員表示董伯起能「不受我物」，其策略可謂成功。而販賣倭刀，是因爲明石道友曾協助他，故方幫忙販售。而審訊無罪釋放後，董伯起還特別寫了一封謝函，根據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的一份〈萬曆四十五年「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抄本，董伯起於函內表示：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書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執事。蒙將軍令送起歸閩，蒙執事治船遣道友護送，我天朝官府皆嘉效順，自海道督府恭府皆出燕勞，從厚錫貺，分船居處，還船

將送所以報答……。人啓蒙，自受惡名。執事今日富已極矣，譬如累棋，極高心墜。此雖於起無與，然蒙恩送歸，莫盡其忠言也。謹頓首拜謝。

萬曆肆拾伍年伍月廿九日書¹⁹（圖9）

就時間點來看，此時董伯起已經回到故鄉，不再受制於日方，故他所寫的書信出於自身意願的可能性甚高。也顯示在這趟東瀛之行中，他受到明石道友不少照顧。

猶有餘緒

此次日明談判雖未有結論，卻因爲這個契機，讓雙方緊張關係略得以緩和，私下商船往來也逐漸得以通航，等於明朝地方政府默認了與日本的貿易活動。²⁰

而當時另有一位名爲桃煙門的日人所率領之船隊因尋找村山秋安侵擾至浙閩沿海。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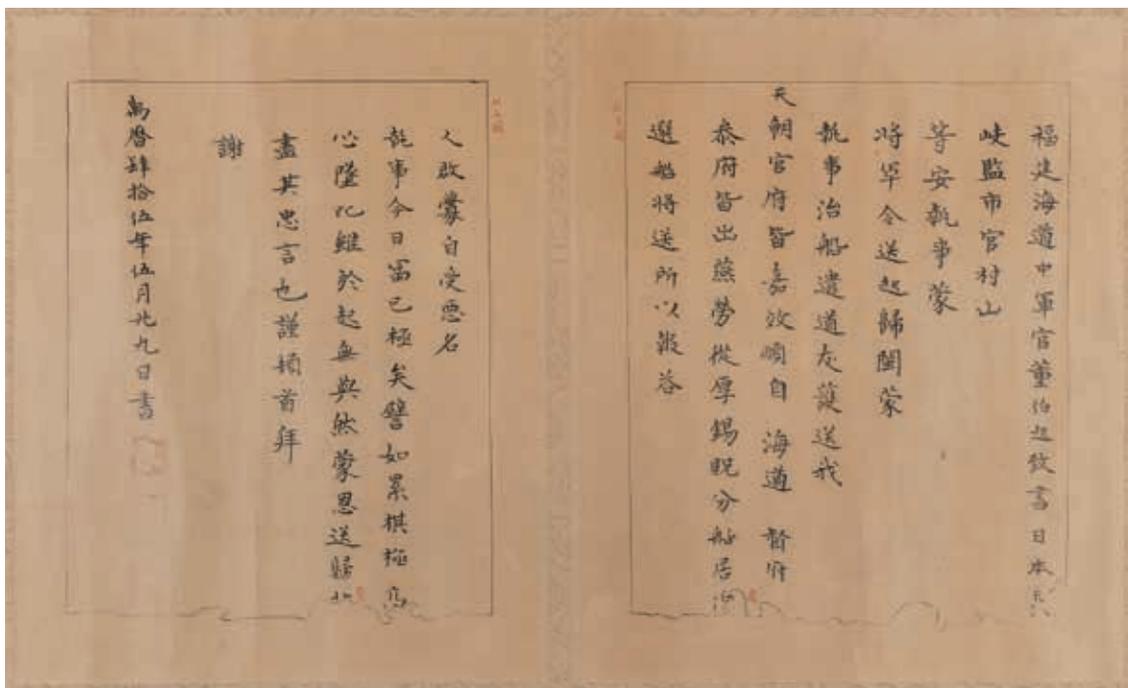


圖9 1617 〈萬曆四十五年「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AH001318

容接獲征討的指示後，轉念一想，先是利用一位與董伯起一同送歸、通曉日語的王居華通事前前去溝通。王氏告知說明石道友已受撫，這讓桃煙門相當心動，遂回復「有道友書來，即從」。沈便派王居華去向明石道友索信，後信到，桃煙門選擇妥協，動亂終告暫息。《崇相集》內稱「東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見有此不傷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糧、不曠時日，

去如振葉、歸若繫豚，捷速而完，功難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當首肯矣。」此外，更有現存於連江縣莒光鄉的東莒島，由董應舉題字的縣定古蹟「大埔石刻」作為見證。石刻上載「萬曆疆梧，大荒落，地臘後挾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圖 10）能有這樣的成果，多少拜明石道友送回董伯起之舉，讓沈



圖 10 位於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島的「大埔石刻」，記載沈有容生擒來犯者而不傷一卒之事。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圖 11 《崇相集》於「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特展內展場陳列景況。 林姿吟攝

有容得有契機不費兵卒將之落幕。

另當於3月20日獲得族孫回閩消息之際，董應舉隨即向曾經來過臺灣、並寫下第一份中文田野觀察報告〈東番記〉的陳第（1541-1617）報告此事。當時陳第身體已經相當虛弱（隔日便逝世），聽聞後仍立刻手書「可語寧海厚犒之」，輾轉交予董伯起去告知應對的官員。而日後交涉的過程雙方即便未有共識，但也尚稱平和。

董伯起最後出現於文獻當中，則於《福建通志》的〈福建忠節傳〉內寥寥數語：「萬曆季，

倭復入寇，伯起與弟貞起力戰死之。」這一趟東瀛之行，或可謂是其人生當中最奇幻的一刻。

結語：意外人生

由浩瀚無邊之湛藍海洋所串連與構築的舞臺，提供了各種既定與預想外相遇的契機。十六、十七世紀多元動盪的國際關係與複雜的海上情勢，除影響了大歷史的走向外，在汪洋的無限延伸當中，讓有些小人物意外地有了驚喜的人生旅程與體驗，並進入到文字體系當中，餘韻不斷。（圖 11）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7輯（1942.8），頁77-118。
2. 關於日本朱印狀與朱印船之研究，可參見岩生成一，《朱印船と日本町》（東京：至文堂，1962）；永積洋子，《朱印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3. 鄭維中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17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臺北：衛城，2021），頁57-59。
4.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1輯（1934.5），頁300-301。
5. （明～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欽定四庫全書叢書本，故叢004215，卷4，頁40b。
6.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頁304-306。
7. （明）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明經世文編選錄·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8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225。
8. （明）黃承玄，〈類報倭情疏〉，《明經世文編選錄·下》，頁230。
9. （明）朱國禎，〈東湧偵倭〉，《湧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1959），頁716。
10. （明）董應舉，《崇相集選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3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頁47。
11. （明）黃承玄，〈類報倭情疏〉，《明經世文編選錄·下》，頁230。
12. （明）張燮，《東西洋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故庫012878，卷6，頁12b。
13. （明）朱國禎，〈東湧偵倭〉，頁716。
14. （明）董應舉，〈中丞黃公倭功始末〉，《崇相集選錄》，頁47。
15. （明）董應舉，〈中丞黃公倭功始末〉，《崇相集選錄》，頁47。
16. （明）董應舉，〈與韓璧哉〉、〈中丞黃公倭功始末〉，《崇相集選錄》，頁21、48。
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9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萬曆四十五年八月癸巳朔」條，頁120。
18. （明）黃承玄，〈題報倭船疏〉，《明經世文編選錄·下》，頁254-255。
19. 〈萬曆四十五年「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國立臺灣博物館藏，AH001318。介紹可詳見岩生成一，〈高砂時代日臺交通新史料—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新着陳列品〉，《科學の臺灣》，創刊號（1933.11），頁12-13。
20. 趙剛，〈德川幕府對外關係史料考〉，《日本學刊》，2006年1期，頁155-156。